

“经学：历史与问题”

主持人语

鲁迅曾云“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”，此先生激愤之语，盖指中国文化的阴暗面或国民性的“幽暗意识”而言。其实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，兼有隐显、正反两面：如果说“道教”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隐幽人格（private self），那么儒学则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公共人格（public self）。作为国家-民族意识形态的儒学研究，经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和超我面向，亦即人文中国的自持（self-assertion）之道。

然自近代以来，先是“六经皆史”，经学降解为史学；尔后西学入主中国，传统人文难以自持，如游魂然，而经学又降解为考古之学，甚至如尸体解剖、细菌检疫之类。此中国文化之不幸，亦人类文明之损伤。诗云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炤。”中国文化的复兴，自当伴以经学之复兴；而经学之复兴，亦当推进中国文化的复兴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复兴经学和复兴怎样的经学呢？

就研究方法而论，我们也许首先需要了解方法的限度、有效域和可能前景。唐文明教授在《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》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：依据西方哲学的范式、话语来研究作为中国“古典教化思想”的儒学，其弊有四，分别是：方法论的暴力、价值的无根性、体验的缺失以及文化主体性的丧失。唐文认为：“在当下的处境中提出儒学研究的范式转移的问题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教化的立场。依据教化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来构想儒学，应当包含四个必不可少的门类：经典儒学、历史儒学、系统儒学和实践儒学。”确实，经学史研究是经学研究的重要一环：所谓经典研究和系统研究都应当首先由此展开。另一方面，“经学是五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规范和指导中国人生存的大经大法，对它的探讨就是从整体上探讨传统中国文明的本性及其可能性。”这一说法也令人深思。郭晓冬和曾亦两位教授的文章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。郭文《从春秋公羊学的夷夏之辨看儒家的民族关系理论》通过阐述《公羊》经学的核心观点——“夷夏之辨”说指出：

《春秋》夷夏之辨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区别，而是在于证明夷狄进于中国的可能性与合法性，即如两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融合与最终形成的历史实践所示者；就此而言，“中华民族的民族性，便不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种族性，而是决定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”；进而言之，“我们讲中华民族之复兴，恐怕首先必须有中华文化之复兴，舍此无所谓民族之复兴。”与之会心不远，曾文《传统“中国”与现代“中国”：以公羊学的外内例为中心》通过回顾康有为公羊学说在传统“中国”向现代“中国”转变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，以及孙中山、毛泽东引日本为诸夏的战略定位，进而申明了经学“治世”的实践指向和政治哲学内涵。

本栏目的最后一篇文章——《执中建极：河汾经学概论》，通过分析“河汾之学”这一经学个案，指出王通（文中子）承集七代家学而深造自得，其学抱负朝野、综衡南北、凌轹今古、平准经传，以天下为心，为中国立法，足为后来之风仪。即如“河汾之学”所示，经学有在朝、在野之分，或曰官方经学与民间经学，未来的经学不必也不宜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；在儒学尚在游魂为变的历史条件下，经学研究保持介然独立的民间立场和兼济天下的精英情怀（这两点可以完美地结合于大学），不亦可乎？